

历史译丛

LISHI YICONG

5

一九六三年

K₀
3

重 要 启 事

本刊物所载译文，系供内部参考之用；读者如引用其中文字，註明出处时請一律用原文所载报刊书籍名称。

历 史 译 丛

1963 年第 5 期

历史译丛編輯委员会編

(北京建内历史研究所內)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复兴門外翠微路 2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 17 号

中華書局排版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經售

*

(内部发行)

*

787×1092 毫米 1/16·6 1/2 印张·127,000 字

1964 年 7 月第 1 版

1964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1,770 定价：(9) 0.80 元

統一书号：11018·530 64.6. 京型

目 录

論“活动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作用……〔苏〕H. H. 鮑尔霍維提諾夫(1)
美国的“自由土地”和特納的历史观……〔苏〕A. B. 叶菲莫夫(17)

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美〕F. J. 特納(30)
美国边疆的安全活塞作用

——安全活塞說的一生、死亡、轉生和釋罪……〔美〕E. 封·納尔德罗夫(53)

評介与文摘

評《边疆的前途》……〔美〕O. 拉铁摩尔等(79)

边疆：(一) 美国历史上的边疆……〔美〕F. L. 巴克孙(82)

(二) 从地理观点和社会观点来看边疆……〔美〕R. B. 范斯(86)

历史学派和历史学家

特納小傳……〔美〕F. L. 巴克孙(90)

学术生活

美国的中国研究側面观……〔日〕宮崎市定(91)

捷克斯洛伐克的亚洲研究……〔捷〕J. 馬萊克等(95)

英国的历史科学組織……〔苏〕A. 梅尔逊(98)

零訊

《明代史論丛》

《鮮通史》

上卷(增訂版)

外国历史期刊要目

(102)

論“活动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作用

——对特納学說的批判分析

(苏) 鮑尔霍維提諾夫(Н. Н. Болховитинов)

在美国資產階級史学中，“活动边疆”的問題得到特納(1861—1932年)創始的所謂中西学派的專門研究和探討。圍繞着特納名字和思想的爭論，直到現在 还未宁息。人們写有关文章，开紀念会，出版專門的文件集，等等^①。可見特納是美国最著名、最有影响和最有声誉的历史学家之一^②。

特納的政治和学术兴趣十分广泛，他提出的意念也是各种各样的，但在他的历史观念中，主要是探討“活动边疆”的理論，研究西部土地对美国发展的作用。这是特納在1890年代初第一次提出的問題，当时这位年青的威斯康辛教授在芝加哥 向美国历史协会宣讀了《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1893年)^③的报告。这个报告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国資產階級史学的轉折点：研究家的注意重心开始日益从北美大陆东部移往西部，人們开始把“活动边疆”視為理解美国整个历史、解釋美国发展独特性的钥匙。特納的概念为絕大多数美国資產階級史学家无条件接受，事实上长期沒有遭到批評。据这方面的著名专家之一利格耳看来，特納的提綱在美国輿論中的地位只稍遜于聖經、宪法和独立宣言^④。

这里不能詳述特納的先輩和特納观点的来源。但是可以说，1893年提綱中的許多看法并非新东西，而是当时“社会情緒”的反映。特納本人在其早期作品中已經讲过这些看法。“自由土地”、殖民开拓对美国发展的作用，在特納之前很久就有各种不同的著作家論述过：意大利社会学家A.洛利阿、美国参議員T.本騰、法国貴族托克維爾、美国經濟学家卫克斐尔德，更早的还有黑格尔、李斯特、穆勒和亚当斯密等人。例如，黑格尔在強調世界历史

① 例如拉鉄摩尔(O. Lattimore)的专题报告《历史上的边疆》，載《第十届国际历史学家會議报告集》第一卷，佛罗倫薩，1955年版。在苏联史学家中，A. B. 叶菲莫夫最早認真研究了特納的观点，并发表过下列文章：《特納著作中各种生产方式并存的問題》(《哲学問題》，1956年第5期)；《美国的“自由土地”和特納的历史观》(見本刊本期第17—29頁。——譯者注)。

② 特納的影响不仅限于历史科学范围，而且他本人也不是书房里的学者。众所周知，他是老罗斯福的亲信和威尔逊的密友，曾为后者写过战后欧洲結構的簡略报告。

③ 特納：《边疆在美国史上的重要性》(見本刊本期第30—52頁。——譯者注)。

④ 利格耳：《美国的活動边疆理論》，載《世界史杂志》第Ⅲ卷，第2期，1956年，第362、367頁。

史的地理原則時說道：美國還沒有受到“緊張狀況”的威脅，因為存在着殖民地，人口可以到西部找“出路”，這樣“便消除了不滿的主要根源，保證了現在資產階級制度的生存”^①。也值得注意的是，托克維爾曾經論述過向西部——特別是向密西西比流域——移民的開始，是“美洲的第二次發現”，他指出，在西部，“民主主義達到了自己的極限”^②。馬克思當時在引用衛克斐爾德的話時指出：“衛克斐爾德關於殖民地本質的幾許明見，早就由重農主義者老米拉波，甚至在更早以前，就由英國經濟學者們提示了。”^③

但是，正是在1893年之後，由於特納的提綱的出現，西部問題在美國史學中才在唯一公認理論的基礎上獲得了系統的研究。特納著作之在19世紀末的出現及其備受歡迎，當然不是偶然的：這時正是帝國主義思想蓬勃發展，美國擴張主義者依靠國家的經濟實力公開叫囂必須實行侵略政策的時期。特納宣稱，擴張是美國歷史的基本規律，他把美國歷史的發展同個人主義和民主主義聯在一起，從而大大地促進了美帝國主義思想體系和政策的形成。在美國擴張主義者的心目中，完成向西部的移民，只不過是要把“活動邊疆”遠遠地推到國境以外，推到拉美、亞洲、歐洲和近東等地方去^④。

特納的“活動邊疆”理論的主要點是認為，美國已往的全部歷史（迄至19世紀90年代）在很大程度上是開拓“大西部”的歷史，“自由土地”的存在和美國居民點的西遷可以說明美國發展的特點。特納強調移民所處的新條件、即“環境”的影響，認為這是將舊思想、舊傳統和舊制度改造為新的、美國的思想、傳統和制度的因素。用特納的話說，美國的民主主義“不是由‘不屈者’號船搬來弗吉尼亞，也不是由‘五月花號’搬來普里茅斯的。它是美國的樹林中生長出來的”^⑤。所謂美國社會的社會發展過程的“不斷復原”和特納利用的經濟階段論，是“活動邊疆”學說的特點^⑥。不過，在談到特納學說的實質之前，不能不先看到資產階級史學中廣泛流行的“自由土地”和“無主土地”這兩個詞，其本身就是極端錯誤的。美洲的土地絕不是“自由的土地”，印第安人自古以來就生息於此。他們主要從事打

① 黑格爾：《歷史哲學》（《黑格爾全集》，第VIII卷，莫斯科——列寧格勒1935年，第82頁）。

② 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政治》，莫斯科1897年，第39頁。

③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67頁。

④ 見威廉斯：《活動邊疆提綱和美國對外政策》，載美國《太平洋歷史評論》第XXIV卷，第4期，1955年，第379—396頁。威廉斯研究了特納的思想對老羅斯福、洛奇、海約翰、威爾遜、羅斯福、杜魯門等人觀點和政策的影響。

⑤ 特納：《美國歷史上的邊疆》，第293頁。特納在《西部對美國民主的貢獻》（1903年版）中強調說，“美國的民主主義主要是美國人民在開發西部時所得到的認識的結果”。

⑥ 最近，史學家（穆德、馬林）指出了李斯特在這方面對特納的影響（見馬林：《史學隨筆》，1946，第13頁。特納本人援引過意大利經濟學家和社会學家洛利阿的話：“殖民地使我們在本書中能夠讀到社會歷史的篇章。”這就是說，殖民地的歷史是社會發展的特殊的地質學剖面圖，歐洲早已經歷過的從“原始狀況”到“現代經濟制度”的那些歷史發展階段，是都要在殖民地不斷地“復原”的。洛利阿用殖民地存在“自由土地”來解釋這種現象，認為這是理解社會發展的鑰匙（參看班遜：《特納和華爾德》，附錄一：洛利阿論《殖民地的歷史啟示》一章，第34—40頁）。

猎和部分地从事原始农业,經濟粗放,需要广袤的土地,所以这些土地不仅不是自由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人口过剩的。所謂开拓“自由土地”的全部过程实质上是对印第安人进行最殘酷的战争,以及相伴随的从肉体上歼灭美洲土著居民、把他們排挤到不宜人类居住的僻远地区的过程(这都是用同印第安部落締結有关“条約”来加以掩飾的)。

分区論后来也成为特納学說的組成部分^①。特納說,“活动边疆”和分区,是美国历史的两个基本因素”^②。美国史学在談到南北战争时通常用“分区”一詞。特納认为,必須用“扩大的分区的最活动因素”的角度,即争夺西部斗争的角度来看待这场战争。在特納看来,美国的分区頗似欧洲的民族。

承认美国存在不同的分区(секции)或区(районы),本来是完全合理的。但是,特納的分区理論,起碼有两个根本的原則性的缺陷。第一,特納认为,归根到底,地理条件是决定分区經濟结构的决定性因素;第二,他的理論实质上抹煞了階級矛盾。这些,首先表現于他对西部的評述。例如特納强辯說,尽管美国内部存在着各种差別(指蓄奴州和自由州),“西部在主要方面,即在社会結構和民主主义的理想上,却有共同性”^③。后来,他在表述比較复杂的公式时又写到“老百姓影响的增长”、“美国特殊条件和理想”的巩固和“創造性的乐观民族”在广袤的新地上的建立。特納說:“甚至在种植园奴隶主还在怀疑独立宣言的精神并耽忧地凝望着民主趋向的南方,或者在劳动与資本間的階級斗争业已出現的工业中心,这些力量也不能不被认为或表现为被战胜的了。”^④特納著作中闡述的历史概念大体輪廓就是如此,它在美国史学界获得了众多的拥护者和宣傳者:如K·阿耳瓦尔德、Г·波尔頓、Ф·派克逊、М·汉森、Д·謝菲尔、Д·克拉克、А·克雷文、Р·比林頓……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我們且不詳談“活动边疆”概念复杂曲折的演变經過,但是必須着重指出,它在战后年代中得到最广泛地發揮,不但用来解釋美国史,也用来解釋其它国家、其它大陆、“大西洋共同体”以及全世界的历史。

“活动边疆”的理論总是同美国当权集团擴張主义的意識形态紧密地交織在一起。因此,1945年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活动边疆”学說拥护者的轉折点,决非偶然。海斯(哥倫比亞大学)的1945年12月的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說在这方面具有特殊的意义。海斯強調說,美国的“活动边疆”实质上是联合在“大西洋共同体”之內的欧洲的、或者說“西方”文明的

① 特納的《分区在美国史上的意义》大体上发展了这种理論;它最初发表于1925年3月的《威斯康星历史杂志》,第8卷,第255—265頁。特納后来关于分区論的著作集成一本专集:《分区在美国史上的意义》,紐約1932年。

② 特納:《分区在美国史上的意义》,第183頁。

③ 参看特納:《西部的殖民开拓(1820—1830年)》,載《美国历史評論》,1906年1月号,第306頁。

④ 特納:《1830—1850年的美国,国家和它的分区》(New York. 1950),第591頁。

疆界^①。他认为,现在的“大西洋共同体”是“现代史的主要因素”,这正如它的先辈“地中海共同体”是古代史的主要因素一样。海斯大声疾呼扩大研究范围;他强调说,要理解这样的美洲和这样的“活动边疆”,必须开始研究从“古代希腊人和最初的基督教徒”以来的美国史^②。这个主张,很快就得到极为详细的研究。例如,马金德利克使用“活动边疆”理论解释罗马的殖民开拓,同时论证在特纳概念的范围内可以深刻了解古代世界的历史。兰诺德斯回顾了中世纪,研究了公元1000—1400年“地中海的疆界”。墨西哥学者萨瓦拉研究了西班牙美洲的“活动边疆”。贝尔格把特纳的理论用于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则根据它来看俄国的东进。

“活动边疆”的理论,在“韋勃提綱”中得到最概括的反映:他在1958年的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中强调自己是特纳的学生。特纳在19世纪末提出的是西部土地在美国历史中的作用的课题,而韋勃在现在,在20世纪中期研究的是哥伦布和其他探险家在公元1500年前后发现的土地对整个西方文明的发展起过甚么作用的课题。他在强调他的“提綱”和特纳理论的共同基础时指出:“特纳研究的是一部分‘活动边疆’,我则力图审视它的全貌。如果特纳的提綱正确,那我的提綱也是正确的。如果他的提綱错了,则我的提綱也同样是错误的”^③。韋勃说,从地理大发现时开始,欧洲人不仅散居在现在美国的领土上,而且也散居在加拿大、拉丁美洲、非洲等地,在每种情况下都有自己的“东部”(宗主国)和自己的“西部”(“活动边疆”)。韋勃把所有的“小西部”归纳为一个整体——“大活动边疆”,他把西欧看作“东部”(宗主国)的綜合体。韋勃认为,西欧和“大活动边疆”的关系是理解现代文明发展的最重要钥匙之一。

照韋勃看来,民主主义、商业自由、国际法、资本主义、奴隶制都可以在他提出的“大活动边疆”的理论中找到说明。特别是韋勃很注意用这个理论来解释财富,首先是土地财富的分配。例如他认为,过去的经济学家大体上只研究财富在个人之间的转移(他称之为“水平运动”),这是一种最大的原则错误,因为除“水平运动”而外,还存在“垂直运动”(由统治者向下达于人民和由人民向上达于统治者)。韋勃的“统治者”一词泛指君主、政府和国家。在“大活动边疆”存在的时期(公元1600—1900年),据韋勃看来,占绝对优势的运动是财富从统治者之手转入人民之手(由上而下的运动)。20世纪初期,由于“活动边疆”消失,这个运动实际上停止了,这种情况的必然后果就是“西方世界的危机”^④。

① 海斯:《美国的活动边疆——什么样的活动边疆》,载《美国历史评论》,1946年1月号,第215—216页。

② 也可参看巴利兹:《西方的概念》,载《美国历史评论》,1961年4月号,第618—640页。

③ 韋勃:《作为高级冒险事业的历史学》(中译文见《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1949—1960)》,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49页。一译者注。)

④ 韋勃:《西方世界的活动边疆》(Madison, 1957),第111—126页。

总之,“活动边疆”的理論被美国資產階級史学用来解答美国史和世界史的各种問題(用于古代羅馬和中世紀、十字軍东征、俄国的东进和美国的西进,用于加拿大、拉丁美洲和澳大利亚的历史)。

这个妄称万能的理論的原則上的和方法論的缺陷何在呢?在于特納从地理环境、从外部生活条件,从西部移民所处的“环境”出发,把它們看作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自由土地”,在古代羅馬,在中世紀各国,在俄国和在美国,都确实存在过。可是在理解美国“西部”和俄国“东部”发展的时候,絕不可用“活动边疆”理論、以地理条件或“环境”为出发点,而必須从生产方式出发。誠然,地理环境(也和人口一样)属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是社会存在的重要的和必要的条件,但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水平。

特納的追隨者之一賽蒙斯頗为中肯地表述了“活动边疆”理論的实质。他写道:“任何美国人都可能在地理的意义前进和在历史发展中后退”。賽蒙斯认为,在存在“活动边界地带”的时候,美国居民“能够随心所欲地選擇他想生活的历史时代”。“在竞争中失败了失业者……跑到西部,返回到細小的私人經營占优势的时代”。賽蒙斯根据特納的概念,认为“活动边疆”是美国历史上“偉大的催化力”,是民主、“典型美国人”和“傳統的叛逆者”的发祥地^①。

不能不指出,把西部看作美国民主主义发展的主要根源,把西部农民看作美国人民进步倾向的主要体现者,無論在理論和实际上都很难找到充分的根据。大家知道,农民的本性除进步倾向以外,也包含保守倾向。历史上有过不少的例子:农民甚至成为最反动势力的支柱。我們不妨回想一下法国史,回想一下馬克思关于法国农民具有两重性、企图拘守旧制度、保持并巩固小块土地的評述^②。持有土地,把自己的地段圈起来与邻人隔离,乃是千千万万西进先鋒者的理想(虽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现实的)。值得注意的是,甚至特納的追隨者利格耳也考虑到許多研究家的材料,不能不承认移民情緒的实质是保守的,而不是激进的。“从东部迁来的移民,原封原样地把自己原来的理想带到了西部,他們对于发展新的生活准则,沒有时间、沒有精力、也沒有奢望。他們甘冒命运的危險,目的只是想获得他們心目中合乎东部准则的那种成就:舒适的房屋、寬敞的倉庫、大群的牲畜、肥沃的田野、銀行的存款,等等。”^③至于美国民主主义傳統发展的决定因素,十分明显,資產階級民主改造的主要发源地是資本主义关系比較发达的东北各州。东北地区的劳动人民(工人、手工业者、农民等)無論在1775—1783年独立战争时期,無論在19世紀20—30年代,

① 參看賽蒙斯:《美国历史中的社会力量》,莫斯科1925年,第90—91頁。

②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18頁。

③ 前引利格耳书,第374頁。

無論在1861—1865年內战时期,都是走在西部农民运动斗争的前面^①。

据賽蒙斯看来,一切美国人,只要“扛起步枪”,就能随心所欲地“进入蛮荒之境”。但是不能不指出,任何人都不能“扛起步枪”重返石器时代。这不仅是因为步枪比打磨粗糙的石块具有无比大的威力,而且是因为“扛枪”的人是另一种时代的产物,是与原始土著完全不同的物质和精神力量和兴趣的体现者。真实情况同特納及其追随者所描述的情景大异其趣。“扛步枪”的美国人事实上从未突然成为原始社会的成员,而是成了从19世纪初开始就主宰密西西比河流域和远西区的A.A.阿斯托尔毛皮公司的职员^②。

因此,特納在联系着西部存在着“自由土地”而提出美国发展特点的问题之后,就用錯誤方法解答这个问题,为美国辩护、頌揚美国的特殊性。特納及其学派把“活动边疆”变成一种特异的偶象,把美国的资本主义曲解为例外的资本主义。他们从地理条件出发,不考虑与生产方式——影响开拓性质的决定因素——有联系的主要规律,把美国历史发展的特点說成是美国历史发展的本质。其实,“活动边疆”是美国北部和南部都有的,可是大家知道,北部和南部殖民潮流的性质是完全两样的。

* * *

美国西部的殖民开拓究竟是什么性质,它的基本趋向和动力是什么呢?它是回到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形态,抑或归根結底是资产阶级統治下资本主义在农业中进化的最进步形式呢?最后,这个过程在美国是怎样具体发生的,西部社会到底是什么样的社会呢?

大家知道,列宁曾区别两种过程:“(一)资本主义在旧的人烟稠密的国家或这一国家的一部分区域内的发展,(二)资本主义在新土地上的发展。第一种过程表现了已经形成的资本主义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第二种过程表现了新地区中新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形成。第一种过程表示资本主义发展的加深,第二种过程表示资本主义发展的扩大。”^③ 西部的殖民(更准确地說是北部殖民潮流)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发展扩大的过程,是资本主义的范围向新的土地上扩大的过程。其次,列宁曾把农业中,资本主义的进化区分为两种主要的类型(普魯士式和美国式),而农业发展的美国式道路是最迅速的和最进步的道路,生产力在这条道路上得到比較自由和迅速的发展。列宁說:保证农业按照美国式道路发展的变革

① 参看A. B.叶菲莫夫:《在特納著作中各种生产方式并存的问题》(苏联《哲学问题》,1956年第5期,第137頁)

② 这里,我們可引用一些能够說明阿斯托尔公司在“文明边界”活动规模的材料。1815—1830年,仅密西西比流域,“美国毛皮公司”就开支2,100,000美元,收入3,750,000美元,純利潤1,650,000美元(史密斯:《阿斯托尔》,費城—倫敦,1929年,第222頁。这在当时是非常大的收入。而且應該注意到这还仅仅是阿斯托尔公司活动的一个地区內經過縮小了的官方数字。

③ 《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版,第513—514頁。

是最有利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變革的形式^①。列寧同時着重指出：這種“變革是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基礎上進行的，而且變革的結果必然正是這些生產關係的進一步發展。簡單地說，即使取得了最完全的自由，即使農民在爭取土地的鬥爭中獲得了最徹底的勝利，整個社會經濟仍然要受市場和貨幣的支配。爭取土地的鬥爭，爭取自由的鬥爭，就是爭取資產階級社會生存條件的鬥爭，因為即使實行最民主的共和制，即使通過任何形式把‘全部土地交給人民’，資本的統治仍然保持着。

“不熟悉馬克思學說的人，可能覺得這種觀點很奇怪，但是，要相信這種觀點是正確的，並不困難，只要回憶一下法國大革命和它的結果，以及美國的‘自由土地’的歷史等等就行了。”^②

西部土地的殖民開拓，起初自然稍許地延緩了資本主義的加深，但是正如列寧所指出，其代價是“為資本主義火災”準備了新的大量的“燃料”^③。

在研究西部殖民開拓的性質問題時，重要的不僅是從原則、理論上和抽象地正確理解實現這一殖民開拓的道路和實踐形式，而且要具體詳細地考查這些形式。貧苦的居民階層、城鄉的普通勞動者，實際上有沒有獲得移居西部土地的通行無阻的途徑呢？他們是不是真的能夠隨心所欲、輕而易舉地變為獨立的農民，並且在資本主義的美國保持自己獨立的地位呢？

美國資產階級史學，首先是特納學派，把西部的殖民開拓說成實質上是一種田園式的過程，但即使略微考察一下事實，也證明完全不是這樣。甚至是殖民開拓的初期，移民當中也不存在財富的平等，除美國資產階級史學熱烈講到的“勞動農民”而外，參加開拓的還有投機者、大農業資本家、佃農、以及一般不提的農業工人。鐵路公司也得到了大片土地。

已有許多著作論述1862年的宅地法（關於份地的法律：每個美國公民交稅10美元，可領取160英畝土地；在五年期內或不及五年而每英畝交付1.25美元，土地即為耕者所有）。它確實是十分重要的資產階級民主的文件，在美國歷史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如果把西部殖民開拓的全部過程都歸結為一個宅地法，把它視為美國新農場建立的唯一來源，則是錯誤的。歷史文獻中人所周知的事實是：1868—1900年，按照宅地法移民獲得了約60萬份、面積八千萬英畝的土地^④。這當然是個很大的數字。但是整個說來，在1900年以前，

① 《列寧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51頁。

② 同上，第318—319頁。

③ 同上，第22卷，人民出版社版，第83頁。

④ 參看Г.И.庫羅比亞特尼克：《論前壟斷時期資本主義在美國農業中發展的道路》，載蘇聯《近代史和現代史》雜誌，1958年第4期，第50頁。為了比較起見，可以指出，早在1870年代初，鐵路公司就得到21,500萬英畝土地，約等於法國、意大利和比利時面積的總和。此外，應考慮到第一批按宅地法取得土地的人當中，很大一部分是投機公司的代理人，他們冒領土地，然後將土地賣給真正的移民。

按照宅地法得到的土地,按戶数,占同期美国出现之新农场的 $\frac{1}{8}$ 弱,按土地面积则占 $\frac{1}{8}$ 强^①。每百个新农场中只有十六个是根据宅地法取得的土地,而且这里还得假定,所有按宅地法取得的土地,都确实是掌握在移民的手中。

美国农业中雇佣劳动的材料,特别是开垦“自由土地”的早期材料,对了解西部殖民的性质有很大的意义。列宁把使用雇佣劳动的程度当作资本主义在农业中发展的主要标志^②。美国资产阶级著作界——特纳、克拉克、巴克逊、利格耳、比林顿和其它“边界理论”的专家——没有研究过,而且显然认为不需要研究这个问题^③。

根据官方统计的材料,美国农业工人人数在1860年是795,679人(农场总数为2,423,895个),到1880年增加到四倍多,达3,223,876人(农场4,225,945个)^④。1860年的调查数字,已经表明美国存在农业工人,尤以“自由土地”较多的西部各州为多,例如,伊利诺斯州(农业工人47,216人,农场143,310个),印第安纳州(农业工人40,827人,农场131,826个),密执安州(农业工人35,884人,农场62,422个),艾奥华州(农业工人27,196人,农场61,163个),以及在当时还有许多所谓“自由土地”的其他各州^⑤。例如在艾奥华州,从事农业的每百人中,有23人是工人,在堪萨斯州是19人,而在旧的西北,农业工人的百分比在20—28之间。

1860年美国已经存在上述数量的农业工人,尤其是他们的人数到1880年增加到四倍多的事实,具有重大的原则意义。它说明了资本主义关系在美国农业中发展的情况,使我们能够彻底埋葬关于劳动农民经济占完全统治的神话。

列宁根据1900和1910年的调查材料,对美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作出了光辉的、经典的分析^⑥。研究19世纪的调查材料,将有助于透彻理解列宁在20世纪初潜心探讨的那些现象的根源。

诚然,美国的调查材料,特别是关于使用雇佣劳动问题的材料,如列宁强调指出,是远不完备的。1860年调查中的农场工人或1880年调查中的农业工人,不单是指雇佣工人,而且往往也指农民的家庭成员。例如盖茨在研究1860年调查簿的原本时,发现这个范畴中往往包括十五岁以上的农民的子女。可是没有统计临时工,没有进行调查的日期,这也影

① 商德:《农民的最后边疆》(New York—Toronto, 1945),第51页。

② 见《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4、91页。

③ 也许盖茨的著作可作为某种例外,他研究了西部的土地投机问题:注意到一方面西部有农业工人和佃农,另一方面有大资本主义农场、投机公司和其它。见《边疆的透视》,第143—165页。

④ 《第八次调查。1860年的美国人口》,(Washington, 1864),第663页;《第十次调查。美国人口》,华盛顿1883年,第724、730页。

⑤ 《第八次调查,1860年的美国农业》,华盛顿1869年,第222页;《1860年的美国人口》,第662—663页。

⑥ 见《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92页。

响了統計总数。6月1日調查的农业工人人数不能表明实况,不能說明农场主使用雇佣劳动的程度。因为这时播种工作已經結束而收割工作尚未开始。如在一两个月以前或以后作調查,情况就会大变。因此,列宁不是沒有原因地注意到:如果統計的只是职业雇佣工人或把任何使用雇佣劳动的情况都估計在內,是有巨大差异的。列宁写道:“农业中对雇佣劳动力的間或使用有着巨大意义,因此不應該只滿足于确定雇佣工人(固定的和临时的)的数目,而要尽可能地确定花在雇佣劳动上的費用总数,这在任何时候都应当作为一項准則。”^①

在美国統計中,1890年的調查人員第一次注意到了农业雇佣劳动的費用。但是很可惜,統計結果沒有公布。盖茨研究美国艾奥华州一个区的原始材料(这个材料很有价值,因为艾奥华当时是典型的、有大量“无主”土地的“边疆州”)后指出,在拥有土地的1,634名农场主中,932名(即一半多)或多或少地使用了雇佣劳动,为此每年平均开支150美元^②。

在研究西部殖民的时候,除农业工人的材料外,第一次出現在1880年調查材料中的关于佃农的資料,也有不小的意义^③。在西北和中部各州,佃农比重为:伊利諾斯31.4%,印第安納23.7%,艾奥华23.8%,密执安10.1%。在远西各州,佃农的比重小得多,华盛顿7.2%、犹他4.6%,蒙塔納5.3%;可是在加利福尼亚还是有19.8%,在奥勒岡还是有14.1%^④。

虽然,整个說来,西部各州佃农的比重(包括最远地区)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但是美国中部和西北部各州的佃农毕竟起了巨大的作用,因此,在評定密西西比上游广大土地发生的社会以及在某种程度上評定远西区(加利福尼亚)时,自然不能不注意它們。

所謂“自由土地”仍然广袤的各州,在存在宅地法的情况下竟然有佃农和农业工人,乍看起来是反常的現象。但是“自由的”、“无主的”土地,乃是一片荒野。它能变为有出产的农场,但是,为此除投入劳动外,还得消耗相当多的物資。丹賀夫引証了关于1850—1860年在西部組織一个农场所需資金的很有趣的数字,即起碼要1,000美元。这笔錢包括开辟和圈圍40英亩的地段(不算购买),建造住房,家庭生活开支,购买种籽、农具和牵引力等費用^⑤。丹賀夫的統計中不包括迁居和购买土地的开支。一般說来,这个数字显然正确地反映了当时美国的条件。自然,在实际上,移民往往沒有这样多的錢。正是这类移民不得不充当佃农、甚至作雇佣劳动。对这些人來說,建立独立的經濟总是困难的,往往得拖延

① 見《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4頁。

② 前引盖茨书,第146頁。

③ 《第十次調查。农业》,华盛顿,1883年。

④ 商儂按照1900年的調查材料推算出来的关于1880—1900年佃农比重的总表(前引商儂书,第418頁)。

⑤ 丹賀夫:《組織农場的开支和“安全活塞”》,載《政治經濟学杂志》,1941年6月号,第354頁。

一段時間。

于是产生了一个問題：当时，工人能不能积蓄足够的錢搬到西部建立农場呢？按照丹賀夫引用的材料，19世紀中期，中等工人每天工資1美元上下。熟练工人每天可得1.5—2美元。至于农业工人（这些人当然特別关心掙錢建立自己的产业）的工資大約是一年130美元。很难期望每年能从这样的工資中积蓄大大超过50美元的錢^①。所以假設一个工人在一二年內能积累足够建立自己农場的錢数，未必合乎实情。

因此，不能不談談特納概念中最有趣的、当时曾有爭論的主張之一——“安全活塞論”。据特納的意見，“活动边疆”是不幸者、不滿者或被压迫者的“出路”和避难所^②。这个理論在特納著作中沒有得到多少詳尽的研究，可是並沒有妨碍它长期以来得到为数众多的拥护者。

但是，大約从20世紀30年代中期起，美国出現了一些研究家（古德里治，戴維逊，商儂，丹賀夫等等），对特納的提綱作了极为細致的批評。已經查明“安全活塞”理論同重要的事实材料是格格不入的，例如，美国急剧加强西进运动的时期，总是同經濟高漲的时期，而不是同危机的时期相一致的。按照美国官方統計，西进运动的頂峰恰恰发生在1819、1837和1857年經濟危机开始之前經濟最兴旺的时期，而在危机时期，恰巧出現相反的过程——西进运动急剧地减弱^③。

古德里治和戴維逊在1935—1936年进行的研究，表明向西部迁移的主要是农业居民，而不是雇佣工人^④。因此，所謂“安全活塞”与其說是雇佣工人的“出路”，不如說是农民的“出路”，因为，雇佣工人由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缺乏必要資金而不大願意到西部去，也不大能适应于开垦新地的困难条件。稍后，商儂在分析广泛的文件材料的基础上，証明在每一名城市工人开始从事农业的同时，就有20名农民由农村流入城市寻找工作^⑤。1870年7月2日的《工人辯护报》在回答“失业者为什么不到西部去”的問題时，諷刺地写道：

① 丹賀夫：《組織农場的开支和“安全活塞”》，載《政治經濟学杂志》，1941年6月号，第357頁。

② 当然，不应该认为，特納是这一思想的真正創作者。美国自古以来就在进行爭夺“自由土地”的斗争，并为此使用了各种論据。在19世紀40—50年代，报刊上广泛宣傳“自由地”获取土地的思想，把它作为医治一切灾禍，包括解决城市人口“过剩”的万应灵丹。商儂也引用了这方面的一些材料（参看商儂：《宅地法和劳动力过剩》，載《美国历史評論》，（1936年7月号，第640頁以下）。总的說来，在特納提出他的理論之前很久，“安全活塞”已成为慣用術語了。

③ 关于美国出卖公有土地的材料可参看：《美国历史統計：从殖民时期到1957年》（Washington. 1960），第239頁。

④ 古德里治和戴維逊：《西进运动中的工資劳动者》，載《政治学杂志》，1935年6月号，第161—185頁；1936年3月号，第61—116頁。

⑤ 商儂：《农民的最后边疆。1860—1897年的农业》，第55、357頁。要詳知对“安全活塞”理論的批判，可参看商儂的論文《对劳动力安全活塞說的一次驗尸》，載《农业史》，1945年1月号，第31—37頁。

“第一，許多人沒有錢坐車到那里去；第二，他們沒有耕地的必要工具。如果他們不用牛馬和农具就能耕地，如果在等待第一次收获的时候，吃青草、麦杆和野果就能生活，那时候才談得上考虑‘往西部去’的問題。”^①

但是，在批判特納及其拥护者的强辯观点时，也不能忘記美国历史发展中有着同西部土地的存在和开拓西部联系着的重大特点。

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創始人总是坚决反对关于美国发展的例外道路、关于美国存在沒有階級和矛盾的田园詩式社会的論点。相反，他們总是十分注意研究美国的資本主义发展、社会矛盾和階級斗争，同时指出了美国历史发展的重大特点，包括西部土地在美国历史发展中的重大作用。19世紀80年代中期，恩格斯在談到事实上已不起作用的美国“大安全活塞”問題时着重指出：資本主义制度趋向于社会最后分为两个階級的总趋势，尽管遇到一些矛盾的因素，“在美国比其他地方表現得强有力”，美国已經存在着“終生的、甚至血統的无产者所組成的階級”^②。恩格斯指出美国工人階級外在的生活条件和英国工人的生活条件很不相同之后強調說：“無論在英国或美国，都是同样的經濟規律在起着作用，所以产生的結果虽然不是在各方面都相同，但仍然是屬於同一性质的。”^③

大家知道，18世紀末，阿巴拉契安山脉以西只有22.2万人，占美国总人口的6%；到1820年已有260万人，即占全国的27%；到1850年有1,040万人，占45%，在1870年有1,780万人，占全国人口一半以上(53%)。因此，美国西部人口的迅速增加是不可否认的。但是，“活动边疆”作用的“結構”本身，实际比在“抽象的”理論上，特别是比在特納及其信徒理解的“安全活塞”的理論上，要复杂得多。到西部去的人是各阶层都有：企业家、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佃农等等。工人也在某种程度上参加了这个过程。不过移民們絕對不是都一定变为独立經營的小农民。显然，农场主多半还是农场主，工人多半还是工人，农民多半还是农民，工业家多半还是工业家。自然，移民的社会成分也有某些变动。

西部絕對不是純粹农业的、“非資本主义的天堂”。西部产生的社会也不是单一的。城市生长了，运河和鉄路建筑了，商业发展了，工业建立了。克拉克不无理由地指出，“活动边疆”史研究中的最大弱点之一是这样一种偏見：把西进运动看作似乎是單純的农业运动^④。如果没有辛辛那提、路易斯維尔、圣路易，没有芝加哥、旧金山、密尔窝基等地，西部

① 轉引自Ю.庫欽斯基：《1789—1947年美国劳动条件史》，莫斯科1948年，第208頁。

② 參看恩格斯：《英国工人階級状况》，人民出版社版，第8頁。

③ 同上，第6、21—22頁。恩格斯也激烈地批評过視土地壟断为穷困和不幸唯一原因的亨利·乔治，他写道：“亨利·乔治所希望的是不触犯当前的社会生产方式，这实际上就是李嘉图学派资产阶级經濟学家中的极端派所預期的。”（同上，第12頁）

④ 克拉克：《美国边疆。西进运动史》（New York. 1959），第15—16頁。

是难以想象的^①。由此可见,工人(如果他参加了移民的行列)根本不会变成农民;他也可能在城市里为了求得高于东部的工资而找到地方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西进的移民浪潮,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东部劳动力市场的状况,虽然雇佣工人参加移民行列的本身,如事实所表明,是为数不多的。这种影响表现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复杂的。例如,“活动边疆”吸引了一部分农业人口,从而收容了一些可能变为雇佣工人的人,虽然整个说来,这个过程被多好多倍的流入城市的人所掩盖了。此外,应该着重指出,西部及其向工业东部的产品而开放着的日益增大的市场,刺激了对工人制造的工业品的需求,工人的状况因而也得到改善。总的说来,人口西进的潮流对工人境况的影响,可见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虽然其结果往往最终表现为一个方式。

因此,“活动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大意义是没有疑问的。美国资本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特点,都同它有关系。但是,西部土地的作用是否如特纳及其追随者所断言的,是特殊的呢?“活动边疆”是否根本地改变了美国的全部历史,把美国资本主义变成了例外的资本主义呢?不!不是这样。由于人口明显移向西部,东部地区形成的“真空”为欧洲来的外国侨民填补了。在1790—1880年间,有1,040万欧洲人流入美国。马克思指出,由于“自欧洲来的移民潮流,以极大的速度流入东部劳动市场,所以尽管有移向西部的潮流,还是不能把它冲得干净”,所以在美国的东部出现了“停滞的沉淀”^②。

美国人民争取“自由土地”的斗争,在19世纪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一点归根到底反映在1862年通过宅地法的事实上。但是,美国的经济危机加深了,失业人数增加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尖锐了。

如果特纳学派拥护者所理解的那种形式的“安全活塞”是存在的,那么,为什么它不起作用呢?为什么在1837年的危机时期或者在1873年更严重的危机时期,以及在继后的萧条时期,当百万失业者被抛向街头的时候,它没有起作用呢?如果这个“安全活塞”实质上在它正是应该起作用的时候不起作用,那末严格说来,又怎能将“自由土地”或整个西部称为“安全活塞”呢?对这些问题,答案只能有一个:特纳及其信徒所说的那种“安全活塞”是不存在的。西部不曾有任何田园诗式的社会。西部土地的历史是资本主义扩大的历史,是资本主义关系在新的土地上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它导致了资本主义在全国的最迅速发展。

* * *

以上所说,主要只符合于北部的殖民潮流。首先是由奴隶主种植园经济利益决定的

① 此外,魏德的研究证明,西部城市时常在大规模开拓之前就建立了(魏德:《市镇边疆, 1790—1830年西部城市的兴起》,Cambridge, 1959)。

②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977页。

南部的殖民傾向在美國歷史（無論如何到1860年止）上具有不下于此的意義。馬克思曾一再指出，奪取新的領土是奴隸制度的獨特需要，是奴隸制度的生存條件，是奴隸制度發展的“經濟規律”^①。為了追逐利潤，種植園主力圖擴大棉花生產。而要增加南部種植園的生產，原則上有兩個途徑：（1）不斷地擴大種植園奴隸主粗放經濟的地域，（2）使用最殘酷的剝削黑人的形式。只有這樣，作為“商業剝削制度”的種植園奴隸主經濟，才能順利發展。不過，剝削的程度當然不能無限增加。馬克思指出，有時只要七年時間就使黑奴失去生命的過分勞動成為在每一件事上都被計算的制度的因素了。在過短的時間內消耗奴隸的生命，經濟上是不合算的。在奴隸制度下，很難提高勞動生產率。大家知道，低下的生產率和墨守成規的技術，是一切基於奴隸勞動的生產的特點。除開奴隸不關心提高勞動生產率之外，應該估計到，基於奴隸勞動的生產的經濟原則，是只使用最粗糙、最笨重的、不易損壞的工具^②。

但是，如果說在舊的地方很難提高粗放的奴隸制經濟的生產率，那麼，擴大地區和轉而利用西南地方新的肥沃的土地，則是可行的。而且如果考慮到舊的土地地力迅速被損耗，轉向利用新土地就更加必要了。恩格斯說：“南部的大地主，應用他們的奴隸和貪婪的經營制度，使地力損耗到這種程度，以致在這些土地上只能生長松樹，而棉花的種植則不得不往西推移。”^③ 種植園經濟的粗放性質，低下的勞動生產率，墨守成規的技術，單一的作物（棉花、部分煙草、米、甘蔗），所有這些，使得這些作物的栽培很快就無利可圖，因為存在着在西南方奪取新的土地並加以貪婪掠奪的可能性。舊的東部蓄奴州（如弗吉尼亞），從1820年開始，就由於地力損耗，栽種棉花和煙草開始被認為無利可圖了。因此，到19世紀第一個二十五年末，棉花的主要產區就轉移到西南的新州。種植園主為了牟取利潤，得時時考慮擴大棉花栽種的面積。密西西比河流域的下游在1820—1830年間，就牢固地成為棉花王國。當1819年危機之後棉花價格降低、以致東部舊產棉區生產長期停滯的時候，在西南新的肥沃土地栽種棉花的種植園主，甚至在低廉的價格下仍然得到了相當多的利潤。

美國資產階級研究家的許多著作傾向於掩蓋擴張同掠奪性奴隸制經濟間的關係，歪曲擴張的真正原因。這裡可以指出兩種頗為流行的觀點：第一，西進運動的主要擁護者不是奴隸主而是貧苦農民。從而這些居民階層被說成是領土擴張的主要倡導者。第二，掠奪式的利用土地和轉移到新的土地上去的必要性，被說成不是與種植園奴隸主經濟的擴展有關，而是與存在着……有利的自然條件有關，從而替奴隸制度開脫掠奪式地利用自然

① 馬克思恩格斯：《論美國內戰》，人民出版社版，第67頁。

② 參看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267、216頁。

③ 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版，第182頁。

資源,其中包括損耗地力的責任。

美国奴隶制历史专家腓力普斯根据乔治亚州一个山麓地区的統計材料作出結論:似乎首先和主要想去新地的根本不是种植园主而是貧苦农民^①。結果,腓力普斯认为是典型性的这个地区內,奴隶主从1800年的520戶增加到1810年的760戶,以后到1820年大体上稳定在1810年的水平上,在此以后,逐漸减少到1860年的540戶。可是,种植园里黑人的入数平均增加一倍,而在最大的种植园里則增加了三倍。另方面,貧苦农户是不断减少(从1790年的880戶减少到1860年的200戶多一点)。假定这些材料是正确的,也只能証明大种植园經濟在竟爭中排挤了小农經濟。黑奴集中到种植园里,特别是集中到大的种植园里的情形迅速增加了。这十分明显地証明,正是种植园奴隶制度是向新的地方擴張的主要原因,虽然腓力普斯引用的数字本身不很能說明种植园主西进的情况。但在一定程度上它們也反映了特别是1820年后种植园主向新地的轉移。

至于破产的小农民,当然也参加了殖民运动,甚至通常走在移民的前列。他們有些人希望“成功”。在新地区也有一些人有可能变成奴隶主和发起財来。但开辟“黑地”的絕大多數人却是很快就变为牺牲品——大投机者、大銀行家、更主要的是种植园奴隶主的牺牲品。种植园經濟的浪潮,随农民先鋒之后涌向西部,經過比較長時間的斗争后,就消灭了自己路上的“不調和分子”^②。

关于美国南部农业史的一本大部头著作的作者格雷,提出了特殊的論据,反对把奴隶制度看作掠夺式地利用土地的主要原因。据他看来,掠夺式的利用土地是南方自然資源丰富的結果。格雷认为,如果說新英格兰土地之缺乏和人口的迅速增长,导致了集約耕作的和土壤保持的耕作方法,那末,南部丰富的自然資源导致了粗放耕作制的流行^③。但是,显而易见,丰富的自然資源(往往恰恰在別人的領土上)只是提供了产生和发展掠夺式地利用土地的可能性。地力耗損的原因,当然不在于土地資源的丰富,而在于奴隶制度,在于建立在奴隶劳动上的經營的掠夺性,也即是在于南部社会的經濟条件。

馬克思指出,由奴隶种植的南部輸出品农作物(棉花、烟草、糖等等),只有在仅需極简单劳动的广大肥沃土地上使用大批奴隶来經營才是有利的。主要依靠土地的肥沃性而不依靠投資、知識与劳力的集約耕种制,是与奴隶制度的本性相矛盾的。“因此,原先使用奴隶生产輸出品的州如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迅速轉变为蓄养奴隶用以輸至南部腹地的州。”^④

① 腓力普斯:《南部黑人地带的起源和成长》,載《美国历史評論》,第XI卷,第810—813頁;腓力普斯:《使用奴隶劳动和自由劳动的种植园》,載《美国历史評論》,第XXX卷,第745—747頁。

② 关于农民与种植园主之間的斗争,参看A.B.叶菲莫夫:《論美国資本主义史》,莫斯科1934年,第72—78頁。

③ 格雷:《1860年以前美国南部农业史》,紐約1941年,第1卷,第445—446頁;第II卷,第940頁。

④ 馬克思恩格斯:《論美国内战》,中文版,第67頁。